

魏晉南北朝簡史

勞榦 著



中華書局



魏晉南北朝簡史

勞榘 著



中華書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魏晋南北朝简史/劳榦著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2018.9
ISBN 978-7-101-13204-5

I.魏… II.劳… III.中国历史-魏晋南北朝时代 IV.K23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80965号

-
- 书 名 魏晋南北朝简史
著 者 劳 榦
责任编辑 徐卫东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)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
版 次 2018年9月北京第1版
201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规 格 开本/880×1230毫米 1/32
印张7 $\frac{5}{8}$ 插页2 字数130千字
印 数 1-7000册
国际书号 ISBN 978-7-101-13204-5
定 价 49.00元
-

目 录

- 1 / 第一章 绪论
- 25 / 第二章 三国之兴亡
- 41 / 第三章 西晋时代
- 51 / 第四章 东晋时代
- 77 / 第五章 北魏之成立与分裂
- 101 / 第六章 南朝之兴亡
- 135 / 第七章 南北朝的经济问题

165 / 第八章 南北朝之兵制

179 / 第九章 南北朝的文学与学术

附 录

197 / 一 世系表

203 / 二 大事年表

217 / 三 论魏孝文之迁都与华化

239 / 编后记

第一章 绪论

甲 东汉与南朝

中国的全部领土，在很远的古代，都是曾经有人住过的。至少我们不能证明全中国中的某一区域，在古代未曾有人到过。但是中国的华夏文化，却应当以黄河流域为一个重要的据点。

从殷虚的大龟和大量的海贝看来，当时黄河下游和南部的海岸既然有物资的交流，当然也有文化的传播，到了西周以后，南方的开发更有显著的痕迹。经过了立国南方的楚，再经过了西汉和东汉，南北的关系，越来越深，到了三国以后，长江流域更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堡垒了。

凡是一个文化高的民族，比较文化低的民族，更易于

滋生传播。华夏民族文化高，自然也就滋生快，人口密度大，因此不论东西南北，任一方向，都是华夏民族扩张的目的地。

然而中国的西北边境，是一个世界性的大草原，永远在不平衡、不安静的局面下过日子。东南边境，却是易于扼守的丘陵地带，并且又不处于民族迁徙激流的对冲之点。所以西北边境总是建设了又破坏，而东南边境则是建设一步即增进一步；因此东南边境的文化遗产一天一天的丰富，最后便超过了黄河流域的“中原”了。

西北边境的动乱已经成为西北开发程度落后的主要原因，再加上西北雨量的不足，农作物不能给养大量的人口，使得西北文化更为落后。

天时和人事已经使西北边境赶不上东南，再加上东汉初年及东汉晚年两次内部变乱，使得西北一带，更为荒废。在这个时候，汉族虽然自相残害，但塞内和塞外的胡人（匈奴、东胡等蛮族），是有组织的，他们并未受到太严重的影响，因此胡人分布的地盘，便乘机增加起来。到了晋代初年，所谓五胡已布满了三辅、太原、上党、河东、北地、西河及新兴郡（河套区域）诸地。原来这些蛮族和汉人杂居之时，因为他们一般文化程度较低，往往被

汉族轻视，到中原不安静之时，蛮族便起而据地称雄，组织政权了。

北方的情形既然是这样的，我们再看一看南方。南方的原野，本来应当只是森林和沼泽，但是在周初已经有汉南诸姬的开发，经过了楚国的开发，再经过了吴国的开发，使得长江流域，变成了繁盛之区。但汉代初年，巫峡以下，够上一万户以上的都市，还只有长沙、南昌和吴县（注一）。并且许多地方，还是利用原始的耕种方法，“火耕水耨”。再经过了西汉一朝，到了东汉时代，许多循吏励精图治的成绩，南方的经营，便渐渐的有了头绪了。最显著的证据，是拿《汉书·地理志》和《续汉书·郡国志》比较一下，便可显然的看出来。西汉西北诸郡人口比东汉密，东汉东南各郡人口比西汉密。到了东汉晚期，刘表的招纳流亡，使得荆州繁荣起来，后来曹操攻击荆州，这一部分财富又到了三吴。

三国的变乱，已经使中原人士纷纷逃向江南，再加上一个东晋南渡，更成了中国中古文化在南方开展的一个重要因素。西晋的开国，在司马氏皇家说来，是一个政治性阴谋的成功，但就这件事的社会意义来说，却是东汉的世家豪族，对当时压迫者曹家政权的一个总攻击。世族

的地位虽然重行增加，东汉遗留下世族中高尚而廉洁的风气却被破坏无余。所以司马氏时复兴的世族，其内容和其意义并不等于东汉的世族，而是另外的一种政治形态。这种执政的世族，使得中央的政治及地方的政治同时腐败下去，最后世族自相争夺，在诸王领导之下起了内战，以致人民的困苦增加了，国家的实力消耗了，士气和人心瓦解了。边疆以外的蛮族侵入中原，终于在中原建立了蛮族的政权。

当着这个时候，中原逃难的人民，像洪流一样的逃到淮泗流域，更转而逃到江南，还有的是从淮泗一带转入荆梁^①。这些流徙的人口，使得不仅江南和太湖区域得到更深的开发，并且闽粤等区域也在这个时期开始繁荣起来。

人口的流亡影响到相关的土地问题和经济问题。在北方因为人口流亡，过去已经垦辟的土地变成荒废。政府方面因为站在财政的观点，开始对土地加以经营，形成了屯田制度，而皇室占田、均田制度等，也在这个情况中发生。同时因为人口流移，户口平均都减少了，南北两方因为争取税源，又引起了大规模的两方政府掠夺对方人口的举动。

^① 编者按：“荆梁”，疑为“荆襄”。

在人口流移的时候，从淮泗而下，集中到荆州和扬州，因此这两股流移的人口，便成了两种政治势力的基本。东晋以后，许多政治上的竞争，大都脱离不了荆扬两州的地域性的争持。此外，流移的人建立政权之后，有了武力及经济上的势力，压倒了原有的住民（其实也只是些更早的移民），因此就发生了“侨”“旧”的问题。因为“侨姓”（注二）往往成为特殊的阶级，他们要保持原有的籍贯，不肯归入南方户籍，以便享受特权，因此“侨郡”“土断”的问题，也就随着发生了。

南朝的政治，集中在荆扬二州，因之荆扬二州的若干都市繁荣了，随着这些都市而发生了贵族庄园，也都渐次的扩张起来。这许多庄园兼并了附近的土地，随即发生了“封山占泽”的现象。其在北方，因为蛮族国家掠夺的人口，尤其是军人和技工，往往集中于首都，因之商业及水利也集中于首都，并且因为宗教信仰的发展，北朝的寺院经济也特别的发达，而首都的寺院就更为加多，更为壮丽，自然影响于首都繁荣的进展也就更为迅速。

这些随着区域的不同而发生的地区性差别，都是便于割据地方势力的，尤其各地有各地特殊的赋税制度及货币制度，使得割据的形式，更为普遍。因此，若干的州郡及

庄园成为自给自足的原始状态。

几个大都市，因为附近的区域较为广大而趋向繁荣，沿海以及西北区域，因为得到国际贸易，也得到了繁荣。但长期封建状态之下，却使许多偏僻的地方，因孤立而荒废，以致中央和地方，起了若干不必要的隔阂。尤其是北魏末期的六镇与洛阳，生活状况、物质享受完全不同，变成了北魏覆亡的重要因素。在南朝因封建领主和皇朝之间利益始终不能一致，不论在哪一个段落之中，都未曾集中有效的力量，也就是注定了南朝限制在长江流域，而无法统一中原，光复华夏。最后统一的还是继承北朝的隋文帝。

乙 东汉的士风与曹魏

西汉一朝学术的演进，儒学已成学术的中心。本来社会道德已经固定了，再加上政治的长期安定，选举的方式，也固定在乡举里选的法则之下。名誉好的士人，才能得着进身的阶梯，他们在本乡可以“仕州郡”，在全国可以选为秀才、孝廉，在《汉书》中的“内行修”就是一个重要的论人的标准。

从西汉经过王莽再到东汉，虽然有治有乱，但大致说来，将近四百载的时期中，并无安心作恶的坏君主（桓灵还只是受人蒙蔽的庸主，尚不至于安心作恶），也没有坏得不堪的外戚，甚至于梁冀虽为罪恶所归，也还能重视人才。这一种安定风气的养成，使得两汉政治上了轨道，使得士风的修饬成为两汉时代的一个重要现象。

这种修饬的士风，约制的儒行，当然也会成为知人论世的准则。其中诚然有许多虚伪的人借着名誉来钓取利禄，但其中也不是没有具有真心信仰而身体力行的人。例如《后汉书》列传第二十九《刘赵淳于江刘周赵列传》，所记的便全是以孝行著称的人。

其中的例子如汝南郡的薛苞，被后母憎恶将他分出。他每日号泣，结庐家外，每朝仍入家洒扫，又被父逐出，仍在里门外作庐，不废朝夕谒见的礼貌。一年以后，父母后悔，仍然还家，后来仍为父母共服六年丧服，哀感动人。再与弟分家，选择坏的房屋和田地。弟不善经营，数次破产，他仍再将产业分给与弟。章帝时皇帝特征召，位至侍中。

又《后汉书·韦彪传》称：“父母卒，哀毁三年，不出庐寝。服竟，羸瘠骨立异形，医疗数年乃起。”这些孝

子，我们可以说，一方面是赋性笃厚，一方面也由于孝友成为一般的道德标准，世人便在不知不觉之中，更培养这种感情，因此也就比其他时期，更为显著了。

再如《后汉书·周黄徐姜申屠列传》称：“仲叔同郡荀恁，字君大，少亦修清节，资财千万（千万即千万钱，当黄金千斤），父越卒，悉散与九族。隐居山泽，以求厥志。”又《王丹传》：“家累千金，隐居养志，好施周急。每岁农时，辄载酒肴于田间，候勤者而劳之。其惰嬾者，耻不致丹，皆兼功自厉。邑聚相率，以致殷富。其轻黠游荡、废业为患者，辄晓其父兄，使黜责之。没者则赙给，亲自将护。其有遭丧忧者，辄待丹为办，乡邻以为常。行之十余年，其化大洽，风俗以笃。”在这方面所表现的，一方面是有些人愿意替乡里做不取代价的服务，另一方面在乡里之中，隐然成为一种势力。

这种乡里中的势力，当然有其光明的一面，也必有其黑暗的一面。所以就有人不愿和乡里中的亲友发生关系。例如《后汉书·周燮传》：“有先人草庐结于冈畔，下有陂田，常肆勤以自给……乡党宗族，希得见者。”《朱晖传》：“屏居野泽，布衣蔬食，不与邑里通，乡党讥其介。”朱晖之子即《绝交论》著者的朱穆。在这里边，又

可见东汉时期乡谊过度的发展，也自然有其流弊。

这种乡谊是从乡和社发展而成的。社的发展很早，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，在汉代大致一里为一社，再经许多社的结合而为乡，由政府聘请乡三老来联系。到了光武建武三年，再命郡国行乡饮酒礼，那就更和儒术接近了。乡饮酒礼，据《周礼》为每三年正月举行一次，汉代承秦法，以十月为岁首，武帝太初改历，许多制度未改，所以乡饮酒礼仍在十月举行（注三）。其后汝南月旦评（见《郅恽传》）也是在十月中举行，可见月旦评和乡饮酒礼，是有若干关系的。

这种乡里的联系，再加上东汉门生故吏和府主宗师的联系，到了桓灵之际，越受外面的压迫，团结便越加坚固；而桓灵之际，又是宦官当政、名士矢志的时代，社会中的知识分子，和当政的皇权，更显著对立了。

这时一般的士人，家世并不完全一致，财产也贫富不等，但立场是相同的，他们都希望有一个清明而公平的中央政府，他们才能有出路。并且也显然的，社会中的中间阶级，或中产分子，是同情于他们的主张。

这一种社会运动发展的结果，不仅要对于君主、贵胄、宦官抗衡，并且对于中间社会阶层，也因为政府中官

吏位置不够，竞争剧烈而互相排挤。当然不免有成群结派的习惯，这也就是东汉的“三互法”的根据，来预防中央官吏和地方发生关系，失去监察的效用。而东汉时代宦官攻击儒生，称为“党人”，也不见得全是捕风捉影，毫无根据。

后汉的党人诚然有不少的弊端，甚至还有许多不近情理的事，但这般人中却也有不少的人，具有过人的操守，发自真诚，绝非出于虚伪。乡党及士人的团结对政治却可以发生别的影响：第一，中流社会形成了一个集团，不便统驭。第二，彼此结党相攻，在政治上不易看出真的是非，更增加了行政方面的困难。第三，社会上过于看重了道德的因素，忽略了能力的培养，因而行政干部有时难以寻觅富有活力的人才。——因此到了献帝时期，曹操当政，便转换了一个另外的方向。

曹操的政治，很显明的有法家的倾向，他对于东汉礼教的风气很不赞同，他直接开展了法家的风气，间接开展了清谈的风气。关于这件事的前因，我们可以做一个分析：

一、曹操本人不是出于礼教的世族，他是一个宦官子弟，他的先天潜意识对于东汉儒生习惯不会赞同。

二、他的本人虽然不完全具有坏的成分，他有时也未

尝没有正义感，不过他的出发点，是法家的，他的道德观念也是法家的，和西汉的酷吏中，如郅都、尹赏等人的出发点都差不多。

三、曹操的少年生活本不同于礼教世家，《三国志》本传说他“任侠放荡，不治行业”。注引《曹瞒传》：“少好飞鹰走狗，游荡无度。”这都是汉代游侠少年的风习。到了曹丕之时，也受到了不少的影响，例如曹丕《典论·自叙》：“时岁之暮春，句芒司节，和风扇物，弓燥手柔，草浅兽肥，与族兄子丹（曹真）猎于邳西，终日手获麋鹿九，雉兔三十。”直到明帝时这种遗风尚有存在的，《魏志·高柔传》：“加顷复有猎禁，群鹿犯暴，残食生苗，处处为害，所伤不赀。民虽障防，力不能御。至如荥阳左右，周数百里，岁略不收，元元之命，实可矜伤。”此种好游猎广禁苑的倾向，还可溯源于曹操的时期。这又是和东汉儒雅的儒生是不同的。

曹操本人既然和儒生不同，是在另外一个立场上，因此他也就在建安时期，利用他当政的地位，发了著名的魏武三令。

建安十五年令：“今天下尚未定，此特求贤之急时也。……若必廉士而后可用，则齐桓其何以霸

世？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？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？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，唯才是举，吾得而用之。”

十九年令：“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，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。陈平岂笃行，苏秦岂守信邪？而陈平定汉业，苏秦济弱燕。由此言之，士有偏短，庸可废乎？有司明思此义，则士无遗滞，官无废业矣。”

二十二年令：“韩信、陈平负污辱之名，有见笑之耻，卒能成就王业，声著千载。吴起贪将，杀妻自信，散金求官，母死不归，然在魏，秦人不敢东向，在楚，三晋不敢南谋。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，及果勇不顾，临敌力战；若文俗之吏，高才异质，或堪为将守；负污辱之名，见笑之行，或不仁不孝，而有治国用兵之术？其各举所知，勿有所遗。”

明说要求的是明白治术的人才，纵然不忠不孝也没有关系，明白显示着曹操用人是不愿受东汉以来一般习惯的拘束。这种用人方法的动机，当然由于东汉以来儒生的道德和能力脱节，越被社会敬仰的人，越是没有能力的人，为着事业的成功，是不能不将能力格外看重而不再顾及道德一项条件。这样标准之下，曹操确曾收罗了不少的人才。